

辩证中求发展 ——论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

杜娟 夏腊初

内容提要:在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下,如何认识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重塑外国文学的教育理念,业已成为推进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由于对象和任务的不同,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高校教师,应该清醒意识到外国文学教学的特殊性,即外国文学教学的当代性、本土性和针对性这三个特点,从而真正发挥外国文学自身的学科特性,实践教书育人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 当代性 本土性 针对性

作者简介:杜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夏腊初,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欧美文学。

Title: Development in Dialectic: Comparis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Abstrac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teaching and teaching research of it differ from each other greatly in terms of the extent of thought freedom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respective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tasks. Namely, there are no forbidden areas in academic exchanges while there are disciplines in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who are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should have an insight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jobs from their standpoint and start point, since they undertake the two job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eculiarity of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e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pertinence.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pertinence

Authors: Du Juan is lecturer in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Xia Lachu is Professor i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field i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是高校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通常而言,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不应存有悖论,因为课堂教学本身就具有学术交流的性质。但课堂教学又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纯粹的学术研究,由于大多以专业人员为交流对象,因此在交流方式、理论深度方面都有别于课堂教学。如果在教学实践中一味追求讲授内容的学术性,就会在部分程度上损害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授课有纪律”,即意味着课堂教学具有学术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

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高校教师大多身兼两任,应该对两种工作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点有清醒透彻的认识,深入认识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说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求真,那么,课堂教学则以求善为首要目标。但在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学术研

究和教学的基本精神却是缺一不可。倘若在课堂教学中一味求真,忽视了对学生的价值引导,那么,课堂教学便会受制于纯学术研究的工具理性,从而失去教书育人的基本宗旨;反之,如果在课堂讲授中不追求相应的学术深度,一味弘扬抽象的善与爱,课堂教学也势必会沦为空洞无味的高头讲章。惟有立足于求真的学术精神,高校教师才能结合课堂教学的自身规律,将学术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在对善的追求中实现育人的终极目标。

有鉴于此,将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进行有机的结合,业已成为当前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基本趋势。那么,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将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呢?本文拟从课堂教学的当代性、本土性和针对性这三方面对此问题做出初步的研究。

一、课堂教学的当代性

这里的当代性,指的是我们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

中,不仅要从学理上对课程内容做出充分的阐述和评价,还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

外国文学教学在多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考证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都采取以史为纲,辅以代表作家作品评析的方式。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能够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既照顾了史的踪迹,又兼顾了作品阐释。但是授课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极大地束缚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如外国文学史往往以思潮划分,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开始,经历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18世纪启蒙文学、19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最后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有时无法兼顾某一段时间其他特色的文学流派和作品,如18世纪的感伤主义潮流等等。时间也往往止于20世纪80年代,对之后产生的优秀作家及成果很少提及,或根本忽视;而分析某一作品时,必然是先介绍作家生平,然后讲述作品创作过程、基本情节,再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这种成套路的讲课方式影响了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形成了学生的思维定势。

由是观之,必须改变外国文学教学内容滞后性的不足。外国文学教学不能忽略不间断发展的、正在行进中的文学史,也不能忽略当下学术研究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外国文学教师一定要及时地总结外国文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去粗存精,将欧美、东方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评价尽可能多地补充到课堂内容中来,力图恢复外国文学史的总体风貌。对以前的作家作品的选讲,也要大范围地内容置换。如对雨果诗人地位的评价,对罗曼·罗兰的文学地位的评价等等。

同时,为实践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教育理念,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作品的讲解时,也要本着学术研究的创新精神,努力改变学生定向思维的缺陷。许多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的作品时,都有过度依赖定论的学习习惯。这种习惯只能使阅读者的思维陷入亦步亦趋的境地,从而在课堂教学中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而一个思维活跃、通过阅读解释活动积极参与到作品再创作过程中的学生,势必会在思维方式的训练中,逐步培养起求实创新、开拓进取的思维能力,这才是现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是,这也并不是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一味介绍、倡导最新最热门的学术研究问题和方法,而是在课堂教学中意义阐释这一环节中,不拘于一家之言,有意识地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并通过布置学生阅读书目、撰写读书心得、参与课堂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逐步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掌握自行思考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的水平。

另一方面,外国文学教学的当代性也是出于当代的时代发展对教书育人提出的新要求的考虑。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西方主流话语的价值霸权正越来越冲

击着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尽管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青年一代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快感,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信仰逐步丧失之后的某种危机感,他们往往因为思想的不够成熟而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由此面临的精神困境无疑会深刻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如何应对这种精神困境和现实挑战就成为了当前高等教育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就有必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培养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优秀人才。那么,这种人才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开放性、创新性的精神结构应是这种现代人才的主要特征。党中央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人才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三个面向”方针,这一方针的精神实质就是培养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人才。但问题在于,如何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中贯彻这种当代性的教育理念呢?

通常而言,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活动,一般通过三个途径进行,即文本本身、文本与作者原意的关系以及文本与接受语境的关系。从文本本身和作者原意去解释文学作品是最为常见的阐释方法。由于我们所讲授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多是一些经过较长历史沉淀的经典名著,其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因此与当今社会的青年读者难免有所隔膜。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作品之所以葆有长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该作品承载了超越历史时空的合理因素,能够引起几代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如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中所蕴涵的生命意识、宗教情怀和自由精神,业已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因此,以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发掘经典作品中的精神资源,不仅可以超越作品本身的历史局限,同样也能通过意义阐释,使其成为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的价值坐标。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就必须注重对该作品在当代社会生活语境中的意义阐释,发掘经典作品的当代价值,并使其成为青年学生的精神财富。这即是对作品的语境义的创新性发掘。显然,语境义更切近当代人生存发展的需要,更富有时代性。例如在对《老人与海》的主题意蕴进行分析时,如果单纯阐释为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显然削弱了这一寓言式小说的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其中无疑还蕴含着自我求证的悲剧、生态主义的反思等多重内容。这种阐释方式显然赋予了作品的时代性,并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人类创新精神的情感认同。

实际上,本文所谓的“当代性”,就是要求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与时俱进。传统的课堂教学,以传达客观知识、培养专业性人才为己任。这一教育理念固然有合理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在“素质教育”愈来愈为国人所重视的今天,仅仅凭借单向度的专业技能显然不足以应对时代的要求。即使是对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来说,随着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兴起,过去那种纯文学的专业研究正日益受到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深刻影

响,任何单一的学术范式都有固步自封的嫌疑。只有具备了充分的创新精神和多学科的理论修养,才能应对外国文学研究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一例子说明,要想做到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与时俱进,就必须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创新性、开放性为己任,如此才能保证高校教师的课堂教学始终适应时代的要求,保证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当代性”。

二、课堂教学的本土性

本土性是指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时所自觉持有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在这一方面,外国文学教学和学术研究有着同样的本土性文化立场的要求。讲授外国文学,由于面对的都是外来文化,因此,课堂教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扬此抑彼,恰恰相反,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汲取异质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资源,使其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由于外国文学课程这种特殊的自身属性,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坚持本土性立场就显得格外重要。

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应当以不断促进传统文化体系的更新,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因此在吸收异质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证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否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势必会趋于断裂,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因为历史的原因,外国文学教学长期受到“欧洲中心主义”、苏俄教学模式的影响。特别在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正日益变得艰难起来。究其原因,除了在全球化影响下西方主流话语的强势介入外,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存有某些问题,比如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民族身份自我认同感的淡薄等等。因此,我们强调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本土性,无疑具有超越一般教学活动的积极意义。

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它绝不排斥异质文化的合理因素;相反,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强调的是“拿来主义”,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保证民族文化优先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异质文化的合理因素,“洋为中用”,不断改进本民族文化的先进性,从而在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现代性追求方面,达到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因此,作为教育领域传播异质文化的重要渠道,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应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异质文化,并通过这一文化参照,进一步提高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从而在促进文化交流和振兴民族文化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那么,怎样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坚持文化的本土性立场呢?笔者认为,本土性文化立场虽然渗透于这项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批评方法的选择无疑应受到特别重视。因为就其根本来说,外国文学课堂的重心就在于

作品的阐释,文艺思潮的介绍、文艺理论的分析都要落实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上来。反思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现状,文学批评的本土性文化立场显然不够突出。自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西方20世纪重要的批评理论彻底改变了外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为繁荣学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一种排斥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提倡西方文本化、形式化批评的学术潮流却极大地削弱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许多人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必须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上,重视对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不能忽视文学文本的主体地位,减少非文学因素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全面影响”(边利丰 184)。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学批评研究就是“从形式到形式,不是从形式到内容,更不是从内容到内容”(罗义华 2)。很显然,这种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向,既是出于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不满,也是对“文以载道”这一传统批评范式的反叛。但就在对传统批评范式的矫枉过正中,许多合理的价值资源也被无情遗弃。受其影响,许多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相应地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

我们承认,形式化批评讲求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对文学现象有着独到的认识。但这种批评方法显然不足以发掘经典作品的深刻内涵。如果我们将文学批评的内涵只限定在形式层面,那么文学自身的价值功能就无从体现。因为文学的价值之一,便是在对“事实”的描写中寻求“应当”,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表达作家认识论的同时,也体现他的价值论,并试图以此影响读者,使其对自己的作品具备情感和价值的双重认同。实际上,任何批评方法和理论并没有高下之分,不同方法因视角、视野的不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片面性和不足,但也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提倡各种批评方法并存互补,不偏废,另一方面注意各种方法的理论特质,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单一的形式研究势必会忽略优秀作品的丰富内涵。

鲁迅在批评某些浮浅的诗人时曾经说:“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20)。尽管鲁迅所指的是诗人和诗歌创作,但同样适用于当前的文学批评。这对于我们从事文学批评研究,尤其是对我们从事文学教育的人无疑的具有警醒作用。试想一下,如果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沦为唯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域,那么我们如何实现教书育人的基本目标呢?从这一点来说,即便是历来被人诟病的“文以载道”,也仍然可以在“道”的现代转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摒弃单一和狭隘的批评方式,是坚持外国文学教学本土性的一个重要原则。

事实上,在当今学界,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批评立场,业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如王予霞在高度总

结了前辈学者的评论基础上倡导建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体系,认为坚持文化主体性、坚持文化主体意识“应当成为外国文学研究者自觉的指导思想”(58)。而聂珍钊教授近年来所提倡的伦理学批评方法,是外国文学研究界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文化体系,而从伦理角度品评艺术形象,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早已成为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因此,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必然会有助于青年学生对本土文化的价值认同。以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分析为例,如果我们仅仅采用精神分析或形式主义等批评方法去分析这个艺术形象,尽管可能会得出某些富有新意的结论,但它却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很少发生联系。假如引进文艺伦理学的批评方式,则安娜的人生道路和伦理抉择,势必会成为比较不同文化传统中伦理差异的一个重要例子。这对学生来说,既开阔了多元的文化视野,又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价值认同,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三、课堂教学的针对性

所谓的针对性,是指我们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和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在篇目的选择、内容的取舍、意义的阐释等环节中,注意将教学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起来,针对学生的思想现状,深入发掘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中优质的思想资源,发挥文学课程的优势,以其积极、健康、崇高、优美的精神内容给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学课堂教学有学术探讨交流性质,课堂往往是师生自由探讨学术的场所,也往往是学术新见、新知的诞生地。教学和教研与纯学术研究在其立场出发点上多有共同之处。但是,在针对对象和目标上,外国文学教学和学术研究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从对象上看,学术交流探讨面对的对象是我们的同行,即要么是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要么是在科研院所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或对外国文学有较深学养的专家。这是一个一般年龄偏大、知识层次高、思想成熟且数量相对较小的群体。而教学针对的对象是无数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国家近年十分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国内绝大多数高校纷纷对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其中的课程内容又有相当部分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由此可知,目前国内高校接受外国文学教育的学生不下数百万,可能达到上千万。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年青、思维活跃,世界观开始形成,但又不很稳定。

从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任务上看,开展学术交流探讨的目标主要是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创造新知识,推动学术发展,不断深化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此外,学术研究当然也有实践的目的任务,即以优质的学术成果引导读者的阅读、批评,为社会的文化需求提供健康

的精神食粮,同时还为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借鉴启发,为我国文化建设服务等等。总的来讲,学术研究的目标是以探求新知、追求真理为主,目标比较纯粹;而教学的目的任务显然要复杂得多,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最新的知识,和学生一道交流探讨学术问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要注意引导学生对各种文学现象、各种学术观点作出有益于学生思想健康发展的分析和价值评判,力求以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情感、意志和价值观。

因此,强调外国文学教学的针对性,依然是我们进行德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学校开设的每门课程都应当以培养学生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人文道德素养为目标。而要在国外文学教学与教学研究中贯彻育人意识,实现教育功能,首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现状,使我们的教学更具有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众所周知,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加之境外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学生的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状况。正如有关文件所指出的,“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漠、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然,要解决好大学生的思想问题,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在此有所作为。外国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思想蕴含博大精深。如西方文学中的博爱精神、忏悔精神、超越精神等等许多价值资源都有利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不仅是时代精神的辉煌代表,也是全人类不朽的优秀文化遗产,其滋润心灵、提升人性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时代和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年学生仍然具有疗救精神缺陷、提高人文素养的价值。

我们强调针对性,并不是鼓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游离课程内容去进行单纯的思想教育,而是尽可能在教学和教学研究中将学生思想实际与外国文学作品思想意义的发掘联系起来,使我们课程既是文学的,又是教育的,而不是偏离文学内容的思想教育课。高校教师应该从外国文学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抓起,如内容的选择、意义的阐释和价值的评判等等。在这几个环节中,内容的选择首当其冲。在某种程度上,教什么比怎么教更为重要。其原因在于,教师的文学趣味往往会影响学生的文学品位。如果教师仅仅凭借个人趣味选择性地讲解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忽略其他文学流派丰富的精神资源和美学追求,从而有悖于培养开放性人才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的几个具体环节中,意义的阐释和价值评判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只有在

创新性的意义阐释中,才能深入经典作品的文本内部和精神空间,提炼富有当代性的思想价值。意义阐释并非终极目标,而是通向正确价值观的必经途径。我们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应当注意将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针对学生的思想现状,深入发掘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中有益的思想资源,以健康、崇高、优美的思想内容潜移默化地改造人,树立学生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如《等待戈多》的荒诞场景和情节使得戏剧笼罩了一种沉闷、痛苦、厌烦、孤寂的气氛,外国文学教师在授课时可以联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分析为何该作品“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从而挖掘出其中蕴含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等待理想来到的执着精神。既教导学生完整地把握作品内涵,也使学生在文学赏析中得到陶冶。

高校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也必须持有正确的价值坐标和体系。由于外国文学作品流派众多、思想驳杂,其价值取向也因此具有纷繁芜杂的特征。伟大的文学作品都饱蘸着优秀作家对人类深广的博爱精神,其中虽不乏催人积极向上的内容,但也有一些消极颓唐的倾向。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固然要关注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各种文学现象、学术观点做出正确的认识,即通过教学实践,做出有益于学生思想健康发展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在传播各类文学思想时,必须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价值指引,即要在深入分析作品内涵的同时,提炼那些有助于完善学生道德意识和情感诉求的合理因素,并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原则指导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只有

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充分汲取外国文学有益的思想资源,并通过课堂讲授深刻影响学生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塑造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教学目的。

综上所述,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同中有异,高校教师要在正确认识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借鉴学术研究的宝贵经验,辩证中求发展,借鉴中求变革,注重外国文学教学的当代性、本土性和针对性。惟其如此,外国文学教学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播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能力,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重大任务。

注解【Notes】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年8月。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边利丰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6(2002):184-186。
 鲁迅:“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9-26。
 罗义华:“中国的形式批评与文化批评——赵毅衡先生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4(2004):1-4。
 王予霞:“建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体系”,《集美大学学报》2(2002):56-60。

责任编辑:何 年